

试释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

王承仁 胡克刚

近代中国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国家,亦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多灾多难之邦。伟大的孙中山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在一生的革命活动中,非常关注自然灾害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认真探究灾荒频发的成因及其治理办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备荒救灾的主张和理论。这些主张和理论,是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内容,是研究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系统研究成果面世,本文拟作初步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中国近代自然灾害频繁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直是孙中山注意研究的问题。孙中山之所以重视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探究医治自然灾害的办法和途径,与他高度同情农民的痛苦生活处境,对农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参加过农业劳动,过着较贫寒的生活。由于“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①”,“早知稼穡之艰难”^②,故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和要求,对自然灾害带给农民的苦难,有较多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直到晚年,他还认为“余中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③。

孙中山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一直有足够的认识,早年,可称得上是一个农本主义者。1891年,他在《农功》一文中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的发展国家经济的构想,并认定只要能“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入有节,造种有法,何患乎我国之财不恒足矣”^④。不久,他更明确提出地利是“生民之命脉”,强调“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能养民,不养民胡能立国?是以先养而后教,以农政之兴为今日之急务者”^⑤。一直到本世纪的20、30年代,他还认为“中国为农业国”^⑥,提出“中国以农立国”^⑦的看法。

正因为孙中山始终关心农民生计,重视农业兴衰,所以他从从事政治活动开始,就“留心经济之学,探究“今天下农桑不振”^⑧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之所以自然灾害频发,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人们对森林的滥砍伐导致的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一是清王朝和封建军阀的腐败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对于滥砍乱伐,他很早就通过具体事例指出:“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不胜用耶”^⑨在《上李鸿章书》中又说:“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⑩。一直到1924年,

他还说“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多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⑪。这里，他把滥砍乱伐、不修水利的主要责任归之于农民，当然是不恰当的。但从破坏生态平衡现象是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的角度看，则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清政府和封建军阀的腐败统治与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的关系，孙中山的认识有一个随着思想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在孙中山的思想还是维新改良思想占主导地位时，他虽然正确地认识到了中国农桑不振和自然灾害频发，与封建官吏对人民的肆虐有很大的关系，指出“盖天生民而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强调要依靠清政府加强领导，以为只要清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机构，用人得当，管理得法，并严加督察，就能使农业发展，国家富强，灾荒得到减少和免除^⑫。为此，他曾责备洋务派不重视农业改革：“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⑬。

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他对腐败政治是使国家贫弱、自然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把治理灾害与推翻清朝统治直接联系起来。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他十分强调中国地大物博，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而现在不仅不能“无敌于天下”，还遭到了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国内则是“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认为造成这种悲惨局面的，“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⑭。其后，他在《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一文中，更是直接了当地指出腐败政治造成了自然灾害，不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就根本谈不上治理各种自然灾害。他说：“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疾病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除非在行政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⑮。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紧接着却是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灾荒有增无减。为什么会这样？孙中山又适时地指出：“武昌起义而后，所谓民国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切政权，仍在腐败官僚、专横武人之手，盖以兵灾、水、旱，迄无宁岁，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即革命未竟成功，因而难收良果也”^⑯。以后他又指出：“因为国家没有方法可以统一，所以全国便大乱不已，灾害频至，祸患没有止境。……现在民国灾患祸害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老官僚、武人还没有肃清。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来。象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和北京的总统、总长，都是小皇帝”^⑰。孙中山的这些分析，是中肯和切中要害的。

对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自然灾害频发有什么关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孙中山都未作直接的回答。20世纪20年代，他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明确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造成中国贫穷、和使自然灾害加重的重要原因。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孙中山在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掠夺使中国每年损失达12万万元的巨款后说：“每年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厉害。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实行他们经济的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自然日蹙，游民自然日多，国家自然日衰了”^⑱。他还举例加以说明：“前三年中国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汉、京奉铁路一带饿死的人本来是很多，但当时的牛庄、大连还有很多的麦、豆运出外国。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因为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没有金钱送到

外国，所以宁可自己饿死，还要把粮食送到外国去”^⑩。孙中山的这些分析，触及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贫穷落和自然灾害频发的根本所在，表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是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表现。

孙中山对中国近代灾荒频繁原因的揭示，完全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是当时对中国社会成灾原因的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灾荒的成因，对备荒救灾更是十分重视，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反动统治者漠视灾区人民疾苦的谴责，他在担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和在广州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对灾区给予了高度的同情和力所能及的救济，更表现在他不遗余力地设计根治灾荒的蓝图，他的备荒救灾思想和理论，在这里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孙中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仅有短短百天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反对派的破坏，临时政府的财政极度困难。即使如此，孙中山仍是尽力救济灾荒。这时根据《孙中山全集》统计，这时直接批复的有关灾荒的文件就达15件之多，内容包括了迅即筹款救济，平时时严禁奸商市侩“抬价居奇”、预防灾后传染病发生，支持民间办救灾垦荒事业，以及卸任在即要求袁世凯迅即筹款救济灾民等。在所有这些批复文件中，都表现了孙中山急灾民之所急的高度负责精神，和作为一个人民“公仆”对人民群众苦难极端同情的高尚情操。如1912年3月，他在接到安徽“灾情万急”的报告后，立即“咨参议院核议借款救济皖灾案文”，强调必须“克日议复，以便施行，事关民命，幸勿迟误”，并表示说：“皖省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仅见，居民田园淹没，妻子仳离，老弱转于沟壑，丁壮莫保残喘，本总统忝为公仆，实用疚心”^⑪；对“江皖灾民愁苦之状，本总统无日忘之。前日经令财政部即行拨款救济，昨又电知北京袁总统设法维持矣。”^⑫对灾后恢复生产也极为重视和关切，如在《令内务府通飭各省慎重农事文》中强调：“军兴以来，四民失业，而尤以农民为最。田野荒芜，人畜流离，器具谷种之类，存者益鲜。自近海内粗平，流亡渐集，农民夙无盖藏，将何所赖以耕植之具？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若全国耕者释耒，则虽四时不害，而饥馑之数，已不可免，国体所关，非细故也。方今春阳载和，正届农时，若不亟为筹划，一或懈豫，众庶艰食，永怀忧虑，无忘厥心。为此，令仰（该）部迅即咨行各省都督，飭下所司，劳来农民，严加保护。其有耕种之具不给者，公田由地方公款。私田由各田主设法资助，俟秋成后计数取偿。各有司当知此事为国际民生所系，务当实力体行，不得以虚文塞责”^⑬。1921年，他在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期间，得到贵州、四川、陕西、湖南、广西灾情严重的报告后，沉重地表示：“自顷迭经丧乱，兵役频兴，水涝旱蝗，不时告警，死亡枕藉，邑里邱墟，哀此孑遗，其何能淑！言念及此，实所痛伤。着由财政部再行拨给贵州灾区一万元，并拨给四川酉阳、秀川、黔江、彭水四县灾区二百（万）元，陕西三原一带灾区七千元，湖南醴陵灾区五千五百元，广西兵灾区域一万元，交由各该省长官遴派公正官绅，妥为散放，毋任流离失所，以副本大总统救灾血难之至意”^⑭。在未担任大总统期间，他仍谆谆告诫革命党人说：“革了命，不能就算事业完成了，大家就可享幸福。请看现在游手无业，饥寒交迫诸同胞，遍地皆是，我们能忍心不顾他们？只能自己享福，岂能长享？我们要永远享文明幸福，必先使全国同胞人人有恒业，不饥啼，不号寒，然后云可”^⑮。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对灾民的极度同情和革命理想之伟大，道德情操之高尚。

在长远的备荒救灾方面，孙中山的主张和设计非常周密和宏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要

完全解决吃饭问题，防灾便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②5}；“斯为全国至重大之一事”^{②6}。如何才能防止自然灾害呢？他认为：

第一，大力兴修江河水利，包括一、“修浚现有运河”。计有杭州、天津间运河；西江、扬子江间运河。二、“新开运河”。计有辽河、松花江间运河；其它运河。三为整治江河湖泊。计有扬子江筑堤浚水路，起汉口，迄上海；黄河筑堤，浚水路，以免洪水；导西江、导淮、导其它河流。四为建排灌站，“用机器来抽水”。他强调指出“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两种工程可同时协理，才是完全治标方法”，兴水利不能只筑堤不疏浚河道，或只疏浚河道不筑堤。他认为做到了这些，也只是做到了“防水灾方法之一半”^{②7}。

第二，植树造林。这是孙中山认为防止水旱灾害的治本方法。他说：“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国的水祸”；“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我们研究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②8}。他以黄河为例，指出“黄河浚河筑堤只是防灾工事之半而已，他事之半，则植树于全河流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是也。”^{②9}强调“中国北部和中部速造森林”^{③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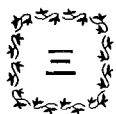
第三，移民垦荒。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③1}。孙中山所指的荒地包括三个方面的土地。一是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东三省等地因人烟稀少而没有开垦的大片荒地；二是人口稠密地区“或因缺水，或因多水，或则因地主投机，求得高租善价，或不肯放出也”^{③2}的荒地；三是由于修浚江河湖泊而新出现的可耕地。孙中山认为这样的土地是相当不少的，仅“填筑江南之湖为所得之地，吾意其数必不在江北之田之下”^{③3}。

移民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海外移民，一是国内移民。孙中山认为，海外移民虽然必要，但国内移民“为尤必要”^{③4}。他说：“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彫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有过剩之虞，彫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地失宜，甚非所以致富强之道”^{③5}，如果“殖边移民，开源浚利，皆为天然之尾闾。”^{③6}又说：“中国土地之大，人口之众，荒地在野，游民在邑，苟知利用之，转贫为富，期月间可办也。”他以为“使用游民，开荒地”^{③7}，既可安抚流亡，又可减轻人口稠密地区的压力，还可以安置应裁之兵，国家转贫为富便大有希望。

孙中山还认为，要使移民垦殖取得实际效果，必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土地应由国家买收，以防专占投机之家置土地于无用，而遗毒害于社会”；二是“国家所得土地，应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而经始之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贷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而兴办此事，必当组织数大机关。行战时工场制度，以为移民运输居处衣食之备。第一年不取现值，以信用贷借法行之”。“一区之移民为数已足时，应授以自治特权。每一移民，应施以调练，俾能以民主政治的精神，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三是“以科学上方法行吾人之殖民政策，则其收效，将无与伦比。以此之故，予议于国家机关之下，佐以外国练达之士及有军事上组织才者，用系统方法指导其事，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国。”^{③8}

第四，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救灾备荒和各种慈善事业。孙中山于1920年11月28日到达广州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任非常大总统兼内政部长时拟定的《内部方针》中，规定设社会事业局，专管育孤、养老、救灾、卫生防疫、监督公益及慈善各团体；设农务局，保护农民、开垦荒地、培植及保护森林，兴修水利”^{③9}。不久颁布的《内政部新官制》中，又明确规定内政部下设司长二人，管理“育孤、养老、救灾、收养废疾、及监督慈善各团体事项、卫生防疫事项，保卫劳动事项，和海河堤防及水利事项；设农务局保护农民、开垦荒地、培植及保

护森林、兴修水利^④等。孙中山的这些备荒救灾理论和主张，是比较完整和科学的，它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并与他所学得的科学知识相结合，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理论和主张。



孙中山的一生，并无备荒救灾的专门著述，也不是专就灾荒谈论备荒救灾，而是往往在议论或设计改造中国的方案时谈到这个问题的。在他还是维新改良者时，他是从发展农业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谈预防灾害、备荒救灾的；当他成为伟大的民主革命的领袖，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纲领后，其备荒救灾思想就与他的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独立、富强和繁荣的新中国的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了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是与他的改造和发展中国的设计相联系，所以他提出的备荒救灾主张，大多不是从消极方面着眼，而主要是从积极的发展经济的视角去思考和提出主张的，因而具有了过去备荒救灾思想所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的内容。

在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中，非常强调垦植、耕种必须逐步运用科学和使用先进生产工具。早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就明确提出：“水患平矣，水利兴矣，荒土辟矣，而犹不能谓之地无遗利而生民养民之事备也，盖人民则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是在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憾也。……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生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田，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此农政学堂所宜亟设也”^④。在1918年的《建国方略》中，则进一步提出：“中国十八省之上地，现仍无以养四万万人。如将废地耕种，且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此同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故尽有发达之余地。惟须有自由农业法以保护，奖励农民，使其护（获）得己力之结果”^⑤。还说：“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⑥。这些思想反映了孙中山要把中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先进农业，以先进的农业防止灾荒和饥饿发生的强烈愿望。

把垦殖、耕种与发展交通运输和商品经济相结合，是孙中山备荒救灾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如他在建国方略中谈到北方大港时说：“中国该部地方，必需如是海港，自不待论。盖直隶、山西、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奉天之一半、陕甘两省之秦半，约一万万之人口，皆未尝有此海港。蒙古、新疆与夫煤铁至富之山西，亦将全恃直隶海岸，为其出海通衢。若乎沿海、沿江各地稠聚人民，必须移实蒙古、天山一带从事垦殖者，此港实为最近门户。……兹港所在，距深水至近，而无河流滞淤，填积港口，有如黄河、扬子江口时时需浚淤之患。自然之障碍，于焉可免”^④。在谈到蒙古、新疆之殖民时，则强调殖民蒙古、新疆，实为铁路计划之补助，盖彼此互相倚倚，以为发达者也。顾殖民政策，除有益于铁路之外，其本身又为最有利之事业”^⑤。他在论述航运业与社会经济兴衰的关系时，强调中国建造四万吨船舶，“此决非不能办到之事也。此四万吨之船，一面输出有余之农产，一面输入必需之货物，且从而为建新船之基础，则此停滞内地各埠之货，不及一年可以悉去，而原产地之货，亦可陆续输出，无朽腐之虞。即此一端，已足使经济上遂非常之发达矣。夫使用游民，开荒地，除厘金之限制，奖励航业，期年之间，不冒风险，所得必较加入条件为多”^⑥。在论述西北铁路系统之建设时又强调指出：“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言之，此为第一需要之铁路。盖所经地方，较诸本部十八省尤为广阔。现以交通运输机关缺乏之故，丰富地域，委而荒壤，而沿海沿江户

稠密省分，麇聚之贫民所无操作，其弃自然之惠泽而耗人力于无为者，果何如乎？倘有铁路与此等地方相通，则稠密省区无游民，可资以开发此等富足之地。此不仅有利于中国，且有利于世界商业于无穷也”；“至于一方人口多而他方人口少者，彼此经济状况，大相径庭。新开土地从事劳动之人民，除富有粮食及原料品，以待人口多处之所需外，一切货物，皆赖他方之繁盛区供给，以故两方贸易必臻鼎盛”^⑦。孙中山这种以发展交通运输业推动移民垦殖事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是科学的和值得吸取的。

备荒救灾，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孙中山思想区别于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显著特点。在孙中山看来，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因而虽然生产发展了，但仍有大批饥饿的人。他以美国为例说：“美国每年运输很多粮食到外国去发卖，粮食是很丰足的，为什么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美国的农业还是在资本家之手，美国还是私人资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生产的方法太发达，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问题便不能够解决。”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意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实行的。因为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因为粮食的生产是以赚钱为目标，所以粮食在本国没有高价的时候，便运到外国去卖，要赚多钱。因为私人要赚多钱，就是本国有饥荒，人民没有饭食，要饿死很多人，那些资本家也不会去理。……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还要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⑧以实现他在三民主义中所规定的“一定要做到年幼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国家的扶养和教育；成年的人，没有一个不从事于社会公共的事业；年老的人、残废者，没有一个不受国家的扶养；病人，没有一个不受国家的治疗。道路治，桥梁修，山不童，藪不涸，野无荒地，市无游民。”^⑨孙中山的这些主张，虽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在当时的中国也不可能实现。但我们从中也看出了他的高度同情人民的优良的政治品质。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备荒救灾的思想理论，是他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备荒救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中一些具体内容和主张，对我们今天的备荒救灾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 转引尚明轩：《孙中山传》第5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6、10、17、1、2、10、5—6、17、21、89、95，11页。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0、120、407、58—60、209、397、407、407、408、409页。

⑶ ⑷ ⑸ ⑹ ⑺ ⑻ ⑽ ⑾ ⑿ ⑿ ⑿ ⑿ ⑿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379、10、265、265—266、252、256、379—380、297、264、379、250、256、264、262、263页。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70、187、264、233—234、532—533、565、397、384页。

㉗ ㉘ ㉙ ㉚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06、432、434、454—455、431页。

㉛ ㉜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2、54、54页。